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青楼文化研究——以《海上花列传》 为探讨文本

科目编号：ULSZ 3068

学生姓名：陈淑萍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教师：辛金顺老师

呈交日期：25/11/2011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v
第一章 绪言	1-4
第一节 研究动机	5
第二节 前人研究	6-9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10-11
第四节 研究难题	11
第二章 “亦土亦洋”的物质生活/文化之展现	12
第一节 娱乐内容之展现	12-16
第二节 生活内容之展现	17-19
小结	19
第三章 妓女意识：从附庸到自主的转变	20
第一节 附庸到自主：历朝妓女意识的转变	21-25
第二节 《海上花列传》中妓女自主意识之转变	25-31
小结	32

第四章	嫖客：从士人到商人身份转变之研究·····	33
	第一节 士人到商人：历朝嫖客身份的转变·····	33-36
	第二节 身份转变对青楼功能之影响·····	36-41
	小结·····	41
结论	·····	42-43
参考书目	·····	44-46
参考期刊	·····	47-48

青楼文化研究——以《海上花列传》
为探讨文本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

日期：

摘要

自 1843 年开埠通商之后，上海日渐成为都市繁荣地区以及形成了亦土亦洋杂处的局面。上海租界是西方人的领地，也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重要据点。而《海上花列传》中所展示的青楼文化正是这个时期的内容。由于西方物质和文化的引进，使得那时候西化生活习惯也逐渐渗透进青楼的生活中，与妓院中固有的生活节奏和习惯融合，并由此交汇出中西文化的风景。此外，基于时代背景的影响下，妓女意识以及嫖客身份开始有了明显的转换。妓女意识从附庸转换至自主意识，而嫖客则从士人转换至商人的角色。这些“主角”都是晚清时期青楼的重要“新”元素。本论文亦考察出由于西潮东渐，晚清的青楼文化，物质生活，均已与往昔的青楼文化不甚相同了。

【关键词】：青楼文化、物质生活、妓女、嫖客

致谢

本论文能顺利完成首先要感谢我的指导论文老师——辛金顺老师。对于刚到拉曼大学执教的辛老师，不管是学生抑或是老师本身或多或少都不是很熟悉对方，然而老师却很愿意地尝试去沟通与了解学生。犹记得第一次见辛老师的时候，大家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结果是大家预料中的是，老师是名非常严格及拥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学生们并不因为老师的严格而有所厌恶，反观之，老师却让学生知晓研究论文的方法及应有的态度。不仅让学生在研究论文有所收获，而在待人处事上皆获益良多。对此，特别致上由衷感谢。

在辛老师未到拉曼大学执教的当儿，谢谢李树枝老师以及方美富老师，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使我在规划论文结构、抒写论文的时候，有了很清晰的概念以及促使论文书写顺畅，这无疑地是老师们帮助了本论文走向更完善的内容。

谢谢我的同窗好朋友们，陪我渡过埋首于文本的日子。瑞民，谢谢你在我每次遇到功课上的难题时，你次次都尽心尽力为我解决问题。欣怡，谢谢你每当我遇到论文、情感等问题的时候，你都非常愿意成为我的最佳听众，听我碎碎念。美仪，谢谢你每次贴心的问候以及诚恳的付出，让我感动万分。还有许多一起切磋琢磨，互相鼓励的同学及学长姐、学弟妹们，谢谢你们让我渡过难忘的时光。

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你们的支持与鼓励，是我努力的动力。谢谢你们包容我所有的缺点，做我坚强的后盾，让我在求学阶段能够无忧无虑，顺利完成学业。尤其是您——爸爸！是您告诉我：“一定要撑完三年，三年很快过的！以后你的生活

就不必愁了！”如今您却没能出席我的毕业典礼，是我一生中的遗憾！不过希望您在天之灵，知晓孩儿并没有辜负重望！而达成您心目中多年来的心愿。谢谢您，爸爸！

第一章 绪言

青楼一词，起初所指并非妓院，也与妓女毫无关系。它最初所指是一般比较华丽的屋宇，有时作为豪门世家的代称。《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六居处部四上这样解释：

《齐书》曰：东昏侯后宫起仙华、神仙、玉寿诸殿，穷尽雕涂，以麝香、杂香涂壁。时世祖于楼上施青漆，世谓之青楼。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纯用琉璃。”¹

可见，用青漆粉饰之楼，就叫青楼。这在当时已相当奢华，可还是比不上“纯用琉璃”者。

不仅如此，《晋书》上记载说：

“允，金城人也，与游氏世为豪族。西川为之语曰：麴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²

这说明“青楼”与“朱门”含义相近，实乃“高门槛”、“大宅院”也。诗歌中也不少这类的“青楼”。例如：

曹植《美女篇》：“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³

傅玄《艳歌行》：“青楼临大巷，幽门结重枢。”⁴

¹ 【宋】李昉编纂，夏剑钦校点：《齐书》《太平御览》第二卷，卷一百六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页695。

² 【唐】房玄龄等撰：《麴允列传》，《晋书》第八册，卷八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页2307。

³ 逯钦立辑校：《美女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431。

⁴ 逯钦立辑校：《艳歌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一，页555。

江淹《西洲曲》：“鸿飞满西周，望郎上青楼。”⁵

由此可见，“青楼”在魏晋南北朝以前，是与大路、高门联结在一起的，与权势、地位相关，而与艳游、酒色毫无相关。

由于“华丽的屋宇”与艳丽奢华的生活有关，不知不觉间，青楼的意思发生了偏指，开始与娼妓发生关联。诚如梁代刘邈《万山见采桑人》诗首句云“倡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⁶。此处之“青楼”，开始有妓馆之意。

不过，在唐代以前，这种偏指还是少数的。到了唐代，“青楼”之含义渐渐广泛用来指代妓女所居，但是，原有的本意尚有被使用的。尚是本意的有：

骆宾王《帝京篇》：“小堂绮帐三千尺，大道青楼十二重。”⁷

王昌龄《青楼曲》：“驰道杨花满御沟，红妆绶馆上青楼。”⁸

孟浩然《赋得盈盈楼上女》：“夫婿久离别，青楼空望归。”⁹

而用新意的有：

李白《楼船观妓》：“对舞青楼妓，双鬟白玉童。”¹⁰

杜牧《遣怀》：“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¹¹

⁵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三，页 1560。

⁶ 【清】彭定求等编：《万山见采桑人》，《全唐诗》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页 892。

⁷ 【清】彭定求等编：《帝京篇》，《全唐诗》第三册，页 764。

⁸ 【清】彭定求等编：《青楼曲》，《全唐诗》第三册，页 834。

⁹ 【清】彭定求等编：《赋得盈盈楼上女》，《全唐诗》第四册，页 1445。

¹⁰ 【清】彭定求等编：《楼船观妓》，《全唐诗》第四册，页 1332。

¹¹ 【清】彭定求等编：《遣怀》，《全唐诗》第三册，页 950。

李商隐《风雨》：“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¹²

唐代之后，显然已专指妓女烟花世界了。当然，于《全唐诗》中还能找到一些两意兼用的例子。诚如韦庄《贵公子》：“大道青楼御苑东，玉栏仙杏压枝红”¹³，这是沿用古意的。而韦庄《捣练篇》：“月华吐艳明烛烛，青楼妇唱捣衣曲”¹⁴，则指妓院。

宋、元代以后，“青楼”的含义越来越多都是承接偏指的意思。元人夏庭芝的《青楼集》为妓女立传；明人朱元亮《青楼韵语》乃其辑注之《嫖经》。因此，“青楼”最初的本意，反而没被彰显出来，一直至今日，人们所认同的“青楼”这一字眼是烟花之地的专指了。

根据张岱年的《中国文化概论》中所阐释的“文化”¹⁵概念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被称为“大文化”。广义的文化包括四个层次：一是物态文化层，由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可感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二是制度文化层，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包括社会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家族、民族、国家、经济、政治、宗教社团、教育、科技、艺术组织等。三是行为文化层，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见之于日常起居动作之中，具有鲜

¹²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三册，页 834。

¹³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三册，页 840。

¹⁴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三册，页 835。

¹⁵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 2。

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四是心态文化层，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经过长期蕴育而形成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是文化的核心部分。

而狭义的“文化”概念既是与“广义”文化相对。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主要是心态文化，又称“小文化”。因此，晚清时期的“青楼”则属烟花之地，而“文化”则属“大文化”的意思了。理所当然的，青楼文化则从物质生活、妓女、及嫖客元素所构成的。

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西方以现代化武器轰开中国的通商大门，也开启近代上海的历史。上海之所以成为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之一，始于开埠通商，它是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¹⁶，也是第一个成立外国租界区的所在¹⁷。1845年英租界设立，英国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¹⁸选择上海县城北郊一泥滩地作为外侨的居留地，西方人开始兴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城市”，黄浦江口成为上海十里洋场的起点。¹⁹虽然过程历时并不长，仅仅十年，然而一片泥滩地已转变为上海的繁华地区。上海是西方人的领地，也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重要据点，上海在西化的“引导”下展现了

¹⁶ <南京条约>要求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由南到北分别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其中福州、厦门、宁波因地理条件限制，商务并不繁盛，广州贸易一经恢复，再度恢复往昔繁盛，但广州的盛景很快被上海压倒，上海扼长江、黄浦江口，水运便利，又位于江、浙富庶之区，久为对内重要商业海口，1850年起贸易量便超越广州，成为全中国最大的口岸城市，广州的洋行也相继北迁，或于上海设立分行。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51。

¹⁷ 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15。

¹⁸ 巴富尔为英国首任驻沪领事，任期自1842年12月1日至1846年11月8日。见汤志钧等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页946。

¹⁹ 李艳如：〈《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海天鸿雪记》的城市空间研究〉，国立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年，页1。

前所未有更动的文化场景。在这样的情况下，毋庸置疑的，青楼文化也因此被受影响。由此，本论文将以物质生活、妓女及嫖客来探讨《海上花列传》中晚清青楼文化之转异点。

第一节 研究动机

自 1843 年开埠通商之后，上海日渐成为都市繁荣地区以及形成了亦土亦洋杂处的局面。上海租界是西方人的领地，也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重要据点。在那个时候，西化生活习惯渗透进青楼的生活中，与妓院固有的生活节奏与习惯融合，交汇出中西文化风景。然笔者所关心的是并非只是西方文化传入的历程，而是当西方已经登入晚清青楼业的生活，并成为日常所见的场景时，被认为是“新”的西方物质是以什么样的型态存在？又如何和“旧”汇通融合？进而展现出中西混合的新面貌。此处的目的不在区分中与西之间的差异，而在探讨当晚清青楼的日常文化景观已经呈现汇通融合的同时，中/西，新/旧，所展示的物质具体内容究竟为何？不仅如此，除了物质文化，在于人物的思维与人物地位的转换上，又是形成了怎么样的改变？而人物之间的转换，青楼在社会上所展示的功能又何为？由此，本论文将从《海上花列传》这部小说中“以文证史”，在这样大背景的影响下，青楼文化究竟形成了怎么样的一个局面。

第二节 前人研究

以“狭邪”作为妓院的代称，其渊源颇为久远，而对“狭邪小说”的命名则始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将《品花宝鉴》、《青楼梦》、《海上花列传》等命名为狭邪小说，并将其基本特征概括为“以狭邪中人物为全书主干，且组织成长篇至数十回者”。²⁰后来的小说史研究者大都沿用了“狭邪小说”的提法。

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以“近真”的笔法和“平淡自然”的艺术格调被众多的学者一致推为狭邪小说的压卷之作。小说以 19 世纪末的上海为背景，已经脱离以往才子佳人模式的写法，首次全方位地描述了上海妓院的种种情形，再现了上海租界的社会生活。同时，在艺术结构等方面，作者集各家之长，创作了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成熟的吴语方言小说。

前人对《海上花列传》的研究只是对该书作者的生平加以考证，或对小说的人物进行索隐，或者在该书再版时作序、跋，很少有人对它作深入的研究。较早对这部小说进行研 1914 年颠公在《懒窝随笔》中写了《〈海上花〉人名之考证》一文，对书中人物作了简单的考证；1926 年上海清华书局排印本许廑父为《海上花列传》作序，胡适也曾为《海上花列传》作序。在这些序言中，他们分别对小说的结构特点、形象塑造、语言风格等进行了评价。²¹

1925 年刘复《读〈海上花〉列传》对该书的艺术结构、白描技巧、以及吴语方言的运用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该书结构从《儒林外史》中“脱化出来”。由于

²⁰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0 年，页 169。

²¹ 见颠公：《懒窝随笔》，转引自胡适：〈海上花列传序〉，《胡适文存》第三集卷六，台北：洛阳出版社，不著年、月，页 473-478。

作者善用“穿插、藏闪”之法，所以较之《儒林外史》更加“千变万化，神出鬼没”，还认为海上花列传的苏白突出了“地域神味”，是语言学方面也是研究吴语方言的好资料，并且指出该书还具有经济学和民俗学方面的史料价值。²²

此外，赵景深认为《海上花列传》中所写的人物有影射现实的功能，考证小说中的尹痴鸳就是作者自己。并且认为“书中所写人物，各有个性；用吴语写作尤能逼真说者的神态。”²³

1980年，张爱玲先后完成了《海上花列传》的国语翻译和英语翻译工作。国语《海上花》不仅把书中的吴语翻译出来，还在每回后加了注释，甚至在国语本写了《译者识》和《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两篇独特视角的评论，为《海上花列传》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且她认为作者在小说中的自画像是华铁眉。²⁴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海上花列传》的研究较为活跃，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研究逐步走向多元化、深层化。他们有的运用新的文学理论或研究方法；有的从新的视角对文本进行解读。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等虽非以《海上花列传》为主的晚清小说研究著作当中，亦能提供西方文艺的评论角度与科学性的逻辑思考，探讨小说人物典型与作者创作环境，给予《海上花列传》极高肯定的小说定位以及具体明显的研究方向。²⁵而学位论文如李慧琳《晚清狎邪小说海上花列传研究》、李季娥《海上花列传对晚清狎邪小说的承继与开创》于小说史与

²²刘半农：〈读《海上花列传》〉，《刘半农文选》，台北：尔雅出版社，1978年，页97。

²³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济南：齐鲁书出版社，1890年，页118。

²⁴【清】韩邦庆著；张爱玲注译：《海上花落·国语海上花列传2》，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页332。

²⁵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17-123。

狭邪题材的文本定位的探讨；²⁶黄淑贞《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人物研究》对小说的人物形象、性格以及情节发展进行归类分析；江江明《从性别政治论海上花列传中的娼妓生存》则以女性观点对男权宰制的社会结构作为观察，提出性别政治的观点于文中的男女关系的归类分析；吕文翠《现代性与情色乌托邦：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研究》更是徵引大量的狭邪史料，尤其以倡院的文化形态与城市意义，为韩邦庆小说拓展现代性意义。²⁷至于单篇论文方面，如方迎久〈韩邦庆佚诗文钩沉〉收集韩氏其余散作，显示韩氏受到学界日益重视的趋势；袁进〈略谈海上花列传在小说城市化上的意义〉以及罗岗〈性别移动与上海流动空间的建构：从海上花列传中的马车开谈去〉……²⁸更以细部情节的分析，凸显各种韩氏小说的独特意义，以强化《海上花列传》有别于传统小说而反映出上海城市现代化上的意义。

以上是笔者选择比较有影响力学者的观点和研究成果来进行简单的介绍和评论。

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从 2000 年至今，以《海上花列传》为题的期刊论文共有 104 篇。²⁹然而对于《海上花列传》研究青楼范围的论文只有四篇。

²⁶李慧琳：《晚清狎邪小说海上花列传研究》，台中：中兴大学中国文学系研究所硕论，2002 年。李季娥：《海上花列传对晚清狎邪小说的承继与开创》，宜兰：佛光大学文学研究所硕论，2006 年。

²⁷黄淑贞：《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人物研究》，新竹：玄奘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硕论，2005 年。江江明：《从性别政治论海上花列传中的娼妓生存》，嘉义：南华大学硕论，2003 年。吕文翠：《现代性与情色乌托邦：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研究》，台北：辅仁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博论，2004 年。

²⁸方迎久：〈韩邦庆佚诗文钩沉〉，《明清小说研究》，南京：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2002 年。袁进：〈略谈海上花列传在小说城市化上的意义〉，《明清小说研究》，2005 年。罗岗〈性别移动与上海流动空间的建构：从海上花列传中的马车开谈去〉，《东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

²⁹有关数据参考自中国知识资源总库。

序	篇名	作者	期刊	年/期
1.	《海上花列传》青楼世界的都市文化特征	樊玉梅、刘上生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社会科学版)	2006/02
2.	论《海上花列传》青楼生活的时代特色	樊玉梅	商业文化(学术版)	2008/08
3.	科举、文人与青楼：晚清狭邪小说的类型变迁	陆杰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08
4.	西风美雨话“青楼”——《海上花列传》中名妓及高级妓院社会功能研究	申欣欣、张昭兵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8/04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本论文主旨在于探讨晚清时期西洋文化交互影响下，青楼文化呈现出西化色彩，不管是在物质生活、人物身上都阻挡不了西化影响的事实。青楼是古代的娱乐场域，由于其具有娱乐的输送功能，以致弹唱歌曲成了主要情感表述方式，于是影响文学，生产了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朝小说等等题材内容。虽然青楼的概念给了现代人附上一个负面的想象，然而它却是揭示了古代青楼的文化层面和各式各样的妓院妓女生活，从而汇集了社会文化的各个侧面。这样的题材，不仅仅在文学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更多时候正是说明作家们对这一社会现象的关注程度。

而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集中在青楼生活中的物质内容、妓女意识以及嫖客身份之转换。由于时代背景的影响下，青楼文化本质已在这个时候形成了“亦土亦洋”的文化。对于物质内容而言，笔者尝试归纳了娱乐、饮食、生活用品来说明一些旧物质尚存在，然而他们的内质已有一些改变，当然内文当中还增加了处处充满西化色彩的物质内容。对于妓女而言，笔者选择了唐宋时期以及明清时期来探讨妓女意识从附庸到自主的转变原因。选择唐宋时期是因为那个朝代是处于鼎盛时期，而选择明清则是全朝历史时期的一个转折点。对于嫖客而言，同样的笔者选择了唐宋时期及明清时期来探讨从士人到商人为嫖客身份的转变研究。当然，原因也就与探讨妓女意识的原因相同之。

关于论文的研究方法，笔者采用多种方法，以便多方面探讨此研究课题。首先，由于韩邦庆所著的《海上花列传》是吴语版，为了能准确了解及对文本分析无误，为此笔者使用了张爱玲所著的《国语海上花列传》以细读文本，尝试投入与体会文本中的世界。接着，笔者从文本细读中，发掘文中经过西洋文化的影响下，物质生活内容、妓女意识、嫖客的身份有所改变。为了很准确的掌握研究内容，笔者尝试多次阅读文本。此外，笔者也尝试阅读《中国思想史》、《中国通史》、《青楼文化》、《中国妓女文化史》等等相关资料以探勘唐宋以及明清时期妓女意识与嫖客身份转换研究的原因。

第四节 研究难题

本论文研究难题有以下几点：其一、由于韩邦庆所著的《海上花列传》是吴语版，因此对于不懂吴语的笔者来说，是阻碍着笔者继续研究此书。因此，笔者参照了张爱玲所著的《国语海上花列传》以方便笔者更清晰、透彻解读文本。其二、〈青楼文化〉这个研究题目对于笔者来说，过于广大。例如青楼物质生活之展现；从唐宋及明清四个朝代来研究妓女意识之转变；从唐宋及明清研究嫖客身份转变之原因。基于笔者尚缺乏对青楼文化及历史朝代背景的基本认识，因此必须参阅许多的书籍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其三、笔者发现本文题目难突破前学者所研究的范围，不过笔者已经尽力写出个人观点。

第二章 “亦土亦洋”的物质生活/文化之展现

人类的物质生活包括了衣、食、住、行。由于晚清时代西方文化的入侵下，《海上花列传》中的青楼不仅展现了旧有的物质生活，然而它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及娱乐内容，形成了“亦土亦洋”的多样化局面。因此，本章节将分为娱乐内容以及生活内容来探讨《海上花列传》中“亦土亦洋”的物质生活之展现。

第一节 娱乐内容之展现

青楼之所以迷人，就是它提供了让嫖客享受、纾解压力以及消遣的好地方，而娱乐是人追求快乐、缓解生存压力的一种天性。

自古以来，中国戏曲源远流长，从先秦一直到晚清，都成为市民生活中的一部分。然，听戏或是看戏是晚清最为普及、雅俗共赏、全国百姓参与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海上花列传》经常出现嫖客点戏。其中小说第六回王莲生随意点了两出戏《断桥》与《寻梦》。可见，“随意”即表现出了嫖客凭任自己的娱乐心情点戏以及看戏。嫖客们一边吃着大菜、一边喝酒、一边陪妓女，一边看戏；认为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之一。而有时候嫖客亲自点较为出名或是演技较好的妓女唱戏，除了嫖客对妓女的煽情、调情、传情表演的赞赏与玩味所留下的观剧杂感外，更多的时候是从表演中寻求“足以娱目荡心”的满足。³⁰

此外，第四十六回写妓女们在一起斗蟋蟀。

³⁰叶文心等著：《上海百年风华》，台北市：跃升文化出版社，2001年，页75。

“先将现捉的促织儿下了雕笼，然后将所有‘蝴蝶’、‘螳螂’、‘飞铃’、‘枣核’、‘金琵琶’、‘香狮子’、‘油利挞’各种促织儿，更替放入，捉对儿开闸厮斗”。³¹

斗蟋蟀的文化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它经历了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这一活动始终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长兴不衰，甚至到了晚清时候还是妓女们娱乐的内容之一。

再者，在妓院中最基本的娱乐内容即是“烟赌酒”。首先，自古以来，酒对于士人来说，都是一种抒发自己感情的工具。他们往往失意不得志、婚姻感情不顺意，使之“对酒苍茫不可歌”，“谈兵空有泪”，³²把酒视为逃避无情遭际的麻醉剂，因此借酒消愁。但在《海上花列传》中，酒的作用已经转换为应酬、交际场所的功能。此外，在于饮酒的方式也不甚相同。中国人是“饮”酒，然而西方人则是“喝”酒。所谓的“饮”者，酒杯在手，边品边喝，徐徐而进；所谓“喝”酒，就是放量狂饮。³³小说中的罗子富是个酒徒，一饮就要尽兴，喝了就要闹酒，因此小说有一回与黄翠凤应酬酒席时，罗子富喝个大醉，翠凤害怕他惹事生非，因而告知他不能再喝。可见，“酒”的功能以及方法，也与以往不甚相同了。

妓院赌博最初只是无聊时的消遣，后来渐渐转化成妓院的牟利手段。妓院因此而借此抽头。除了抽头，有的妓女财迷心窍，竟卷入流氓集团的诈骗活动中。小说中的李鹤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十四回“合上合合赌暗通谋”，这个标题已说

³¹韩邦庆著，姜汉椿校注：《海上花列传》第四十六回，台北市：三民书局，1988年，页449。

³²焦润明、苏晓轩：《晚清生活掠影》，沈阳：沈阳出版社，2002年，页28。

³³李淑贞：《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教程》，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66。

明了李鹤汀的相好杨缓缓欺骗。杨缓缓与周少和、匡二一起骗李鹤汀上万元，导致他不到一个月竟输掉三万。但是杨缓缓对李鹤汀未必无情，她总是劝李鹤汀戒赌。这显示了妓女半真半假的感情付出，然而她展现的是以自己利益为主更为重要。

不仅如此，鸦片战争前，西方大量输入鸦片至中国，因而导致了妓院也以吸鸦片作为嫖客的消遣方式。嫖客与妓女不管内心是否高兴、难过，欢喜、悲伤，都依赖此物来消磨光阴，因此《海上花列传》中的青楼处处无不有着“烟”之所在，使青楼都浸润在烟的腾腾雾气中。然而，嫖客于妓院中不会吸鸦片是一种丢脸失格的事，而小说中不嗜鸦片的嫖客仅有洪善卿一人。不仅如此，小说中第四十二回说道赵朴斋，在乡下从未接触过这种玩意儿的他，因为抵达这座引领流行时尚地方的上海后，更是能亲自服侍自己吸水烟或是鸦片，今而变成熟手。

因此在妓院“烟赌酒”三宗法宝终于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么糜烂、充满利益的青楼上大显身手，征服了无数纨绔子弟，令他们沉沦甚至无法自拔。

此外，经过西洋文化层层递进的入侵，妓女并不是“枯燥乏味”的一味在室内等着、陪伴客人，妓女也并不一味的已卖色艺为生，而是要求嫖客给予外在物质上的享受。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晚清时期的青楼生活空间，已经不仅仅是封闭式的局限在青楼内，而是妓女与嫖客开始足门出户，大胆的在外寻求欢乐、赤裸裸的展露他们之间的关系，更确切的说她们是消费的主体了。书场、戏院、饭馆、茶楼是她们消遣的新空间。她们使用马车招摇过市，到街市去接触最新鲜和昂贵的事物。

小说中第八回说道罗子富与黄翠凤去游园，皮篷车“四轮一发，电掣飙驰的去了”

³⁴。另外，如小说中第二十四回提到沈小红两三日就坐一次马车：

莲生道：“俚自家倒无啥用场，就不过三日两头去坐坐马车。”蕙贞道：

“坐马车也有限得势。”莲生道：“价末啥个用场嘎？”蕙贞道：“倪怎晓得俚？”³⁵

甚至在小说第三十四回说道：

善卿道：‘耐自家勿好，同俚去坐马车，才是马车浪坐出来个事体。我阿曾搭耐说：沈小红就为仔坐马车，用场大点？耐勿觉着！’莲生连连摇手道：‘说哉，倪吃酒。’”

可见，沈小红已是被公认爱坐马车的其中人之一，而那时候坐马车出外兜风、游荡是小说中妓女热衷的消闲方式。

根据池志澂《沪游梦影》中所称：

“西人马车有双轮、四轮之别，一马、两马之分，以马之双单为车之大小。其通行最盛者为皮篷车，而复有轿车、船车，以其形似轿似船也，轮皆用四。近更有钢丝马车，轮以钢不以木，轮外圈以橡皮，取其轻而无声，……有两轮而高座者，更名曰亨生特。亨生特者，犹华言其物之佳也”。³⁶

³⁴韩邦庆著，姜汉椿校注：《海上花列传》第八回，页 86。

³⁵韩邦庆著，姜汉椿校注：《海上花列传》第八回，页 86。

³⁶池志澂：《沪游梦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 17。

这种西洋引进的新式交通工具，速度极快而外形特殊，在晚清洋场大路上风驰雷掣。可见，洋化的马车，已经成为妓院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充当了人物、生意的工具。而妓女对于马车的运用，简直无比纯熟。妓女不仅可以和嫖客坐马车出游，甚至妓院自身就备有马车。小说中第五十四回抒写周双玉要出局，但是马车已经给周双宝用了，于是把局给耽误了。这说明了长三书寓都有自己的马车来保证速度，以满足客人应酬的需要。

小说当中也述说了妓女喜欢逛洋行，购时装。

“……忽听栈门首一片笑声，随见秀英领着一个衣包，二宝捧着一卷纸裹，都吃得两颊绯红，唏唏哈哈进房。……二宝复打开衣包，将一件湖色茜纱单衫与朴斋估看。朴斋见花边云滚，正系时兴，吐舌道：‘常恐要十块洋钱哩！’”³⁷

从他们的活动看来，虽然古时候妓女也有逛街的时候，然而逛街的性质不一样了，因此，逛洋行、购时装成为了他们的休闲娱乐内容之一。

不仅如此，晚清时期青楼的休闲娱乐活动尚有挖花、划拳、打茶围等等的旧有的娱乐内容。虽然旧有的娱乐还存在着，然而许多的娱乐性质或多或少已有一些改变。除了在于娱乐内容有被影响的情况下，而下节将探讨《海上花列传》中的生活内容。

³⁷韩邦庆著，姜汉椿校注：《海上花列传》第八回，页 86。

第二节 生活内容之展现

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内容既是衣食住行，当社会生活越进化，物质生产越发达，人类的生活内容也会随之转变。因此，本节将从饮食、日常用品来叙述《海上花列传》的生活内容。

首先，《海上花列传》中第十九回中所展露的既是从小食方面着手。

先是十六色外洋所产水果、干果、糖食暨牛奶点心，装着高脚玻璃盆子，排列桌上。……一时，屠明珠把自己亲手剥的外国榛子、松子、胡桃等类，两手捧了，送来给黎篆鸿吃。篆鸿收下，却分一半与朱淑人，叫他：“吃点口。”淑人拈了些，仍不吃。黎篆鸿又问长问短。³⁸

小食有着榛子、松子、胡桃、干果、糖食暨牛奶点心等等，都是来自外洋所产的，是之前朝代未有的小食品。而且这些小食看似很好吃、也很吸引人，但是并未受得大众的喜爱，甚至小说中的“淑人沾了一些，不吃”。可见，这样的饮食文化入侵，市民看似已接受与适应，然而实况看来，他们的反应却是与此相反的。不仅如此，小说中还说妓女与嫖客常吃大菜。小说第十八回说：

朱蕩人向身边取出一篇草帐，道：“倪末两家弟兄搭李实夫叔侄，六个人作东，请于老德来陪客。中饭吃大菜，夜饭满汉全席。三班毛儿戏末，日里十一点钟一班，夜头两班，五点钟做起。耐说阿好？”³⁹

³⁸韩邦庆著，姜汉椿校注：《海上花列传》第十九回，页 183。

³⁹韩邦庆著，姜汉椿校注：《海上花列传》第十九回，页 178。

可见，吃大菜已经逐渐成为他们正餐的习惯。也让吃大菜成为了一种时髦的追求。为了追求时尚，屠明珠还在自己的寓所五幢楼房，为“大菜”而做出一个大菜房。

再者，小说中的青楼日常用品已经开始注入了西化的元素。不管是洋灯、煤气灯、西式大洋镜、自鸣钟等等的生活用品，已经流露出农民社会与都会的巨大差别。煤气灯都是中国传统中从未有过的新兴器物，它被装饰在黎篆鸿的老相识屠明珠的厢房内，透露出浓浓的西洋情调与韵味。这样的装饰品，不仅展示了主人的品味，也为客人营造了良好的消费环境。此外，小说第十九回说：

“吃大菜的桌椅……仍铺着台单，上设玻罩彩花两架及刀叉瓶壶等架子，八块洋纱手巾，都折出各种花朵，插在玻璃杯内。”⁴⁰

“只见大菜桌前一溜儿摆八只外国藤椅。”⁴¹

屠明珠在小说中属于年纪较大，入行较早的一位。其书寓中融入了大量的西化元素。在餐具的选择上，西方的刀叉代替了传统的中式餐具。罗兰巴特曾从餐具的使用上分析了东西文化的差异，中国使用筷子显示了其平衡左右的中庸之道，而西方的刀叉则在餐饮方式上体现了其悍猛好战的风格。⁴²因此，屠明珠书寓中出现的刀叉餐具也透露出当时西方文化介入中国的事实。

虽然整个书寓氛围充满西化色彩，然而从屠明珠的五幢楼房，还是有着旧式家居装饰如床帏、琴棋书画。

⁴⁰韩邦庆著，姜汉椿校注：《海上花列传》第十九回，页 183。

⁴¹韩邦庆著，姜汉椿校注：《海上花列传》第十九回，页 183。

⁴²【法】罗兰巴特著，孙乃修译：《符号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94年，页 21。

原来屠明珠寓所是五幢楼房，靠西两间乃正房间；东首三间，当中间为客堂，右边做了大菜间，粉壁素帟，铁床玻镜，像水晶宫一般；左边一间，本是铺着腾客人的空房间，却点缀些琴棋书画，因此唤作书房。⁴³

这些床帟、琴棋书画等等的点缀品显示了古式的东方韵味。或许这些点缀品对于当时的青楼业来说，还是不可或缺的装饰品，因而让整个书寓的氛围充满西化且东化交替的新旧韵味。

小结

由于《海上花列传》所展示的地域是上海，而上海是晚清时期繁荣的地域之一，因此青楼生活中虽然物质内容还保留了一些就旧有的，然而更多的是已经受了西化的影响，而处处充满西化色彩。诚如上海历史学者唐振常先生的说法，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层面比它的“精神”层面更容易被中国人接纳，至于上海人对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形式的接受，明显遵循一个典型步骤：“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羨，后继则效。”⁴⁴可见，这种影响是至深的。

⁴³韩邦庆著，姜汉椿校注：《海上花列传》第十七回，页 165。

⁴⁴唐振常：《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2年，页 12。

第三章 妓女意识：从附庸到自主的转变

妓女是青楼里的主角，缺少了她，就没办法形成完整的青楼文化。自古以来，妓女的出现就被认为是一种病态的文化现象⁴⁵。从社会地位上来说，妓女是被摒弃于礼教伦常之外的特殊外层，比普通女性的地位还要低，也被披上贱民的外称。这样卑微的身份地位，已经给她们套上自己完全没有人身自由、不能自主的意识；这样的传统文化无疑是在她们的人格上烙上了“自卑”的印记，这种自卑的心态又衍生出“依附”与“自贱”的心理⁴⁶。而这个导因往往就是取自于社会制度、社会思想的禁锁。然而不同的时代，即产生不同的妓女意识。因此这一章节将探讨唐宋时期的妓女附庸意识和明清时期妓女自主意识间的转换以及《海上花列传》中妓女自主意识之展现。

⁴⁵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页9。

⁴⁶钱民辉、田玉荣：《中国女性行为的文化释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页6。

第一节 附庸到自主：历朝妓女意识的转变

基本上，妓女巴结嫖客，这就是一种附庸的形态。妓女巴结嫖客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她们们的生活来源全靠嫖客供给，因此不管嫖客今天的心情特好，亦或是明天的脾气非常暴躁，她们都必须一一想尽办法讨好嫖客，让他们的心情大好，这就是成为妓女的第一门面功课。这些妓女以艳丽的姿容、妩媚的情态来拉拢自己与嫖客的关系，希望自己能在弱肉强食的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唐代妓女既是如此。她们名声地位的升沉，几乎全要取决于名士举子的品题月旦，因为这将直接影响着妓女的衣食来源和青楼的营业收入。

晚唐范摅的《云溪友议》载：

崔涯者，吴楚之狂生也，与张祜齐名。每题一诗于倡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措。⁴⁷

这种“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措”的处境，逼使妓女们不断提高各方面的修养。尽可能地揣摩士人的好尚，通过心灵的沟通以牢笼自己的客人。唐代时期唐玄宗设置了左右教坊，左边都是善歌的，右边都是善舞的。因此唐代的妓女，基本上她们本身被培养出非常高的文艺素质。笔者认为虽然那时候她们的文艺素质非常的高，然，她们的艺术气质，看似依附于制度，然而最终还是归咎于依附嫖客（皇上）的所喜所恶来进行的。

⁴⁷【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下，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页71。

不仅如此，老鸨是妓女们的“假母”。一旦妓女没有巴结点做生意，或是看妓女不顺眼，或是教不会，这些老鸨将不顾颜面，随意的虐待妓女。《北里志》“海论三曲中事”中已透露出一些妓女受鸨母虐待的苦况。“初教之歌令而责之，其赋甚急，微涉退怠，则鞭扑备至。”⁴⁸这大约是初入妓籍者必经的一关。这样的“受罚”形式，妓女是无可避免，并且还得忍气吞声的依附老鸨直到妓女找到归宿为止。《北里志》中的杨妙儿、王团儿，进入这一职业就注定她们将堕落，并且让以利益为主的恶鸨任由摆布。

此外，许多的妓女最终归宿还是从良为妾。她们是由一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无奈心态转变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一种依附心理。⁴⁹她们依然希望“好男人”来拯救自己。因为这样不仅可以使她们往后而生活有所依托，而且还可以使她们摆脱低贱的妓女身份而成为良民，从此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当然，她们想要获得成功，除了与自身的天赋、素质和主观努力密切相关外，主要还是取决于男人（嫖客）的好恶和赏赐。例如刘禹锡《泰娘歌引》中，说明了妓女刘泰娘她可悲的境遇，选择为人做妾的归宿，到头来还是投入夫权婚姻的圈子。此外，妓女假使要使得自己的地位稳固，还往往取决于她们是否能博个“金孙儿”，为男家传宗接代。从此看来，她们还是摆脱不了对男性的附庸意识。

由于宋朝时期新儒家的崛起，因此妓女们不能在这么强大的伦理纲常面前掩饰自己卑贱的地位，她们只能充当取悦男子的工具而难得再赢得人格的尊重了。事

⁴⁸见孙棨：《海论三曲中事》，《北里志》，转引自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页12。

⁴⁹钱民辉、田玉荣：《中国女性行为的文化释义》，页6。

实上来说，宋代妓女比唐代妓女地位更为卑微，因此那些士人往往持一种居高临下的调侃讥笑的态度，来对待妓女。妓女因此也成为戏弄的对象。

然而明代时期，妓女全新展现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妓女人格。⁵⁰明代在《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叙述杜十娘得知李生以千两银子的身价将她转卖与新安盐商的时候，突然醒悟，认清了两人的情感是何等脆弱及两人身份的不平等。杜十娘以死对李生人格作出否定，以死来宣示自己人格的不可辱，最终投江自尽。可见，在明代时候，妓女意识，已经开始有了转换。

明清时期，妓女开始展示了自主意识。这是基于以下原因：

其一、明中叶以后，社会商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以工商业为主的市民阶层更加发展壮大起来。尤其是广大市民为了争取自身的发展，维护自身的利益，与封建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说明曾是社会最低层的市民阶层不再俯首于统治者的强权之下，不再甘心于被剥削与被欺压，他们懂得了用自己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其二、儒学内部价值观念的转变。儒家常以“克己复礼”等的传统观念抑制各个阶层的思想发展。然而王学⁵¹学者开始敢于用“本心”去推到传统、人生和自我的观念。明代王守仁认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我心之良知，无有不

⁵⁰ 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页 266。

⁵¹ “王学”是由明代大儒王阳明发展的儒家理学。王阳明则继承宋代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从自己心里即可得到。王阳明的主张为其学生们继承并发扬光大，并以讲会的形式传播到民间，其中又以泰州学派（又被称作左派王学）将其说法推向一个极端，认为由于理存在于心中，因此“人人可以成尧舜”，即使不是读书人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为圣人。王学这种“心即理”看法的发展，也影响了明朝晚期思想中对于情欲的正面主张和看法，由于心即理，因此人欲与天理，不再如朱熹所认为的那样对立，因此是可以被正面接受的，这种主张的代表人物就是李贽。整理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 280-299。

知者”，突出了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冲击了圣贤的神圣地位。明末李贽反对束缚人身的“君子之治”，提倡“因乎人”的“至人之治”，使人人能根据自己的个性自由发展。清代汪中说：“本不知礼，而自谓守礼，以陨其声，良可哀也。”⁵²发表反对传统婚姻制度，反对妇女夫死殉节的妇道。可见，这些学者开始意识到人必须要有自主意识，这不仅仅是围绕在男性方面，然而也对传统女性一直被压抑在传统思想中认为应该获得解脱。

其三、清朝太平天国革命者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潮。自古以来，“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被打破。⁵³从政治上说，妇女可以同男人一样参加起义战斗和革命工作，甚至可以出任官职，带兵参政；从经济上说，妇女可以和男人一样分得土地；从婚姻关系上说，天朝废除了买卖婚姻，开始实行一夫一妻制（但中高级官将仍实行一夫多妻制）；从妇女的人身束缚上说，天朝不仅禁止蓄养奴婢，而且还颁布了“解放缠足令”。⁵⁴因此，这些思想无疑促进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增长。

上文说明，从唐宋时期的附庸妓女意识逐渐转换至明清妓女自主意识，毋庸置疑的，这样的影响往往是取决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以工商业为主的市民阶层懂得用自己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儒学内部价值观念的转变、清朝太平天国革命者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社会风气影响。虽然儒学者以及太平天国革命者所展示的价

⁵² 汪中著、田汉云点校：〈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节议〉，《新编汪中集》，扬州：广陵出版社，2005年，页376。

⁵³ 学者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事考》指出太平天国是“妇女解放思想的第一个实行者。这样大彻底的妇女解放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世界历史上不曾有过，真是人类最光荣最先进的运动。”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55年，页340。

⁵⁴ 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页229。

值观念的转换并非是对妓女而言所成立的，然而往往因为社会风气影响而导致的。

由于《海上花列传》属于清末之作品，因此妓女自主意识更是鲜明地、充分地被展现。故下节将全程探讨《海上花列传》的妓女自主意识之展现。

第二节 《海上花列传》中妓女自主意识之展现

19 世纪中国许多都市已经成为中国极度发达、经济繁荣的城市。而《海上花列传》中所处的位置既是上海。妓女在这种经济极度繁荣的历史背景下，生活在都市商业化的妓院中。也因此她们所展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都与以往不甚相同，尤其是在自主意识方面充分的被展现出来。《海上花列传》中妓女自主意识之展现如以下几点：

其一、自愿为妓。赵二宝挂牌从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赵二宝和母亲前次得到舅舅洪善卿的来信，告知赵朴斋在上海落魄的生活，要赵母劝其儿子归乡。然而赵氏母女日盼夜盼始终毫无儿子归乡的消息。因此，赵氏母女经过与邻居张秀英商议后，一起到上海寻找赵朴斋。怎知一到达上海，张秀英带着赵二宝去书场听书，巧遇张秀英的过房施瑞生。施瑞生带着二人逛街购物，带着洪氏游明园，让二人迷上都市生活，不思返乡。由于洪氏时而称缺少路费，时而称欠了张秀英三十块洋钱，时而又说回去后家中缺少材米油盐。虽说生活贫穷但绝对没有到过不下去的地步，与其说她是被生活所迫，倒不如说是经受不了灯红酒绿的诱惑。洪氏一家钱财用尽，

二宝仍不愿回乡，竟搬到鼎丰里，挂出牌子当了妓女。她的好朋友张秀英也是如此，见二宝生意兴隆，因妒生忌，与施瑞生闹翻，竟也去做了妓女。

其二、突破传统爱情。书生陶玉甫和妓女李漱芳之间的恋曲，可以被视为小说中最具浪漫色彩的爱情之一。他们这对难能可贵的鸳鸯，面对隔阂不入的现实环境、求助无援的生存压力，承受了商业营利的势力考量之际，更需负担传统父权意识的直接逼迫。⁵⁵于此，李与陶形影相随的恋爱关系，非但未受世人歌颂，反倒成众人闲谈的讪笑对象：

人家相好要好点，也多煞口宛，就勿曾见歇俚咪个要好，说勿出描勿出咪！我有日子到俚搭去，有心要看看俚咪，陆里晓得俚咪两家头对面坐好仔，呆望来咪，也勿说啥一句闲话。问俚咪阿是来里发痴？俚咪自家也说勿出口宛。”

耐看玉甫近日来神气常有点呆致致……有辰光我教玉甫去看戏，漱芳说：‘戏场里锣鼓闹得势，要勿去哉。’我教玉甫去坐马车，漱芳说：‘马车跑起来颠得势，要勿去哉。’最好笑有一转拍小照去，说是眼睛光也拔俚咪拍仔去哉；难末日朝天亮快勿曾起来，就搭俚恬眼睛，说恬仔半个月坎坎好。”⁵⁶

此笑语出自玉甫兄长，陶云甫之口，被作者题作“美姻缘填成薄命坑”，笔者认为除了在一开始便预告了李漱芳难以善终的命运，同时也代表父权意识对女性充满歧视的直接压迫。尤其，当云甫以兄长之身份进行婚配制度的时候，是对李漱芳进行了不公平的对待，反对迎娶李氏入门，最终造成漱芳郁结疾病的终极原因。虽

⁵⁵庄仁杰：《晚清文人的风月陷溺与自觉——《品花宝鉴》和《海上花列传》》，台北市：秀威资讯科技出版社，2010年，页310。

⁵⁶韩邦庆著，姜汉椿校注：《海上花列传》第七回，页74-75。

然李漱芳是被压抑者，但她绝非没有自主的立场，而是以病逝作为女性抗议而无奈的劣势困境。诚如王德威所说的，无论她在喧嚣的上海妓院中郁郁而死去是多么卑微可笑，她的死亡标志着她在道德上不仅战胜了上流社会的虚伪，而且也战胜了自己当初为了顺从社会期待而显现的自卑与虚荣。⁵⁷此外，王德威还分析她的心里是由一个“麻雀变凤凰的宿命欲望”中展现“志比天高的妓女自尊”。⁵⁸可见，妓女思想突然得到醒悟，也展示了两人的情感在传统社会思想当中是何等脆弱。再者，笔者认为假使李漱芳成为陶玉甫的妾，那么李漱芳也就缺少了自由，不能和玉甫光明正大的进出妓院，只能呆在家中做个贤妻良母。一切妓院事物由不得她来掌管、操心。这对于在妓院生活了整整二十年的她来说，莫非是一种无奈与痛苦。

此外，沈小红为了捍卫自己为夺得王莲生独门生意，不惜扯破同行关系，在众目睽睽之下演出一场拳翻张惠贞，既是对王莲生的新欢大打出手。当时的沈小红全不顾恩客颜面与自己形象“随身旧衣裳，头也没有梳”、“直瞪着两只眼睛，满头都是油汗”，⁵⁹一副凶神恶煞的表情，却也呈现出妒忌之情早已远远超出营利行为的谋略范围，而见欢场女性于性别政治中直截了当、激烈蛮横的自决表现。⁶⁰对于沈小红面对嫖客、姘头、以及同业倡女的竞争，却不顾自己的颜面，直接表示出泼辣、直率的姿态。诚如陈永健分析：

⁵⁷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页 106。

⁵⁸王德威：《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台北：麦田出版社，1993年，页 116-120。

⁵⁹韩邦庆著，姜汉椿校注：《海上花列传》第九回，页 88。

⁶⁰庄仁杰：《晚清文人的风月陷溺与自觉——《品花宝鉴》和《海上花列传》》，页 302-303。

沈小红生意不好，甚至什么时候都可以蓬头垢面的出现，不用随时装扮出局见客人，唯一的客人是王莲生，养戏伶小柳儿也不用粉饰门面，形容任其自然。⁶¹

这样的斗争与自然装扮的行为，清楚显示此女性的直接个性，可说是一种自我肯定的直接表现。由于王莲生去做张惠贞而引来沈小红闹个不停，直到王莲生柔情软语去服侍她，让王莲生替自己还债才肯罢休。小说中第十一回：

莲生一想没奈何，只得打叠起千百样柔情软语去伏侍小红。小红见莲生真个肯去还债，也落得收场，遂趁此渐渐的止住哭声。莲生一块石头方才落地。小红一面拿手帕子拭泪，一面还咕嘈道：“耐只怪我动气，耐也替我想想看，比方耐做仔我，阿要动气？”莲生忙陪笑道：“应该动气，应该动气！我做仔耐是一径要动到天亮哝。”说得小红也要笑出来，却勉强忍住道：“厚皮哝来，啥人来理耐嘎。”⁶²

由此可见，妓女与妓女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其实非对嫖客有任何爱情的想象，而是在于争夺客户。因为有了稳定的客户，才能有大量的金银收入供其挥霍。故此，商业化社会里妓院中的爱情已被打上功利性标签。爱情的意义不再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而是为了获得男人的供养，为了自身和家人的生存。诚如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说道：“《海上花列传》之迥异于多数借道德之名以夸耀堕落之实的晚清狎邪小说，端在它试图以一种真正的对话方式，进行一场美德与诱惑的辩证。”⁶³

⁶¹陈永健：《三攀海上花》，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页66。

⁶²韩邦庆著，姜汉椿校注：《海上花列传》第十一回，107页。

⁶³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页105。

其三、妓女显示了职业的自主意识。周双玉和朱淑人也曾举夫妇生死和同之誓，希望百年好合，但一旦结婚的梦想破灭后，她便伙同老鸨敲诈了朱淑人一万两银子。为了得一万两银子，周双玉将“假鸦片”⁶⁴凑到淑人嘴边，让他喝下。

双玉手举一杯，凑到淑人嘴边，陪笑劝道：“耐吃口。”淑人舌尖舐着一点，其苦非凡，料道是鸦片烟了，连忙用手推开。……淑人望后一仰，倒在床上，满嘴里又苦又辣，拼命的朝上喷出，好像一阵红雨，湿漉漉的洒遍衾褥周。淑人支撑起身，再要吐时，只见双玉举起那一杯，张开一张小嘴，“咕嘟咽嘟”尽力下咽。⁶⁵

利用“假鸦片”以获取该得到的“酬劳”。即所谓的，营利之际无情可谈，这些妓女所要反映的却是展露出职业自主的意识，以自己的职业利益为中心。此外，黄翠凤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职业妓女了，她很忠于她的职业，爱情对于她来说只是一种谋取实力的工具，她使出各种手段引罗子富上钩，一次又一次地敲诈罗子富的钱财。如小说中的第五十九回“攫文书借用连环计，挣名气央题和韵诗”。

黄二姐笑道：“罗老爷，我勿是瞎说呀。起初不过借几百洋钱，故歇倒勿是几百洋钱个闲话哉。翠凤无良心，难下去再要无拨仔洋钱，翠凤生来勿借拨我，我也无啥面孔再去搭翠凤借。难得故歇有罗老爷个拜匣来里末，定归要敲俚一敲哉！一万例勿曾多口。前日天，汤老爷拿得来房契阿是也有一万朵？”子富道：“价末耐来浪敲我哉，勿是为翠凤！”黄二姐忙道：“罗老爷勿是呀，翠凤陆里有一万洋钱？生来搭罗老爷借。罗老爷一节个局帐有一千多吸，勿消三年，就局帐浪扣清仔好哉。罗老爷阿对？”

⁶⁴意思为喂蟋蟀的梨熬成梨膏糖似的黑色浓汁，烧焦了有苦味，再加烧酒，形似、味似生鸦片烟饅酒。见【清】韩邦庆著；张爱玲注译：《海上花落·国语海上花列传2》，页305。

⁶⁵韩邦庆著，姜汉椿校注：《海上花列传》第六十三回，页615。

子富无可回答，冷笑两声，迈步便走。黄二姐一路送出来，又说道：“难末种种对勿住罗老爷，总归是无拨生意个勿好，用完仔洋钱无法子。横竖要饿杀末，阿伯啥难为情嘎？倘然翠凤再要搭我两个强，索性一把火烧光仔歌作，看俚阿对得住罗老爷！”⁶⁶

题目“连环计”是京戏《连环计》用《三国演义》的故事，剧中貂蝉唆使董卓爱将吕布行刺。⁶⁷此回黄翠凤也是利用黄二姐敲诈罗子富，自己扮演一个可怜的“难女”角色，像貂蝉一样，需要英雄救美。因此，上演了一场“掉包计”让黄二姐拿走了罗子富最心爱的拜盒，甚至敲诈罗子富一万洋钱。此外，黄翠凤的脾气不好，甚至连老鸨都不敢管他，还要黄翠凤本身来管老鸨。老鸨随便什么事先要去问她，还要三不时去拍拍她马屁才好。

不仅如此，小说中最为明显展示职业自主意识无非就是沈小红了。王莲生在小说二十四回说道：

我说：‘耐勿做末，就嫁拨我好哉。’俚嘴里末也说是‘蛮好’，一径搭浆下去。起初说要还清仔债末嫁哉；故歇还仔债，再说是爷娘勿许去。看俚光景，总归勿肯嫁人，也勿晓得俚终究是啥意思。

这里的意思十分了然，男人已不再是女人唯一的依靠。妓女靠自己身体的本钱似乎也已经逍遥自在地逛明园、乘东洋车、吃大餐、购买高贵饰物。

其四、试图突破传统的男权中心。在《海上花列传》以男性为主体的中心受到质疑。例如小说第九回，“沈小红拳翻张慧贞，黄翠凤舌战罗子富”。

⁶⁶韩邦庆著，姜汉椿校注：《海上花列传》第五十九回，页 576-577。

⁶⁷【清】韩邦庆著；张爱玲注译：《海上花落·国语海上花列传》，页 270。

只见小红竟掀倒蕙贞，仰叉在地；又腾身骑上腰胯，只顾夹七夹八瞎打。阿珠、阿金大一边一个按住蕙贞两手，动弹不得。蕙贞两脚乱蹬，只喊救命。看的人也齐声发喊，说：“打勿得哉！”⁶⁸

沈小红一方面以爱情的名义，在王莲生另结新欢时，破口大骂，动手打人甚至以自杀相逼，已经体现了对王莲生的那种占有式的爱情。另一方面，却又与戏子钱子刚私底下相会。她对自己欲望已经不再是偷偷摸摸，甚至本文前章提及沈小红爱坐马车，因而导致黄连生消费大。其实沈小红爱坐马车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原因，那就是私底下去与小柳儿约会，并不是真的爱坐着马车招摇过市。故此，沈小红的举动是理直气壮的，充分表现出女性的自主意识。

不仅如此，沈小红之泼辣凶煞，则全以任性自我、直率的反应，早已超过嫖客妓女的关系，她更直接以其自然的个性，对莲生的精神施压，使男性倍感难堪与弱势。如小说中第四回：

沈小红也出房相迎，似笑不笑的说道：“王老爷，耐倒好意思……我要问耐，耐三日天来啲陆里？”莲生道：“我来里城里，为仔个朋友做生日，去吃仔三日天酒。”小红冷笑道：“耐只好去骗骗小干件！”阿珠绞上手中，揩了。小红又问道：“耐来啲城里末，夜头阿转来嘎？”莲生道：“夜头末就住来啲朋友搭哉（口宛）。”小红道：“耐个朋友倒开仔堂子哉！……我到猜着耐个意思来里：耐也勿是要瞒我，耐是有心来啲要跳槽哉，阿是？我倒要看耐跳跳看！”⁶⁹

沈小红对她唯一的财源王莲生，冷嘲热讽的，直接反应出女性不畏男权的气势。

⁶⁸韩邦庆著，姜汉椿校注：《海上花列传》第九回，页 89-90。

⁶⁹韩邦庆著，姜汉椿校注：《海上花列传》第四回，页 37。

小结

综观上述，中古时期的妓女，基本上妓女是处于士大夫文化的附庸地位。她们的仪态修养、谈吐服侍都与士大夫的好尚相适应，她们的雅俗之分，美丑之判断也大抵认同于士大夫的标准。由于明代中叶的社会商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以工商业为主的市民阶层更加发展壮大起来；儒学内部价值观念的转变以及清朝太平天国革命者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潮等的影响，因此，由妓女附庸意识开始逐渐转变为自主意识。她们的自主意识显示了她们除了满足物质生活以及虚荣心以外，其实最为想成为独立的个体、让生活以及个性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以及摆脱长期被嫖客、老鸨的控制。

第四章 嫖客：从士人到商人身份的转变

虽然说，要研究青楼文化而不可或缺的对象绝非妓女不可，然而，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假使没有嫖客的“礼尚往来”，青楼这几千年来所累积的文化，或许早就魂飞逸散。因此，研究青楼中的嫖客是本章节的重点之一。由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产生了不同身份的嫖客；而不同身份嫖客的出现，也让青楼之功能随之改变。由此，这一章将探讨唐宋士人与明清商人的身份转变，以及不同的身份所带给青楼展示不同的功能。因此其余阶层之老百姓作为青楼嫖客暂且不在话下。

第一节 士人到商人：历朝嫖客身份的转变

众所周知，唐代最为注重的就是科举制度。科举是政府用为取士任官的主要方法。根据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的考定，唐代每一年到长安来应试的这些举子，一共有二、三千之多。⁷⁰这些经过科举晋士将享有社会特权，即凡名登科第者可免差徭服役。加上，唐代官场上的职位大多数从进士中选拔，具有极高名望，前程无可限量。由此可见，士人是受万人仰慕的上层社会分子，故青楼女子对于他们的崇拜与爱慕是可以理解的。

到了宋代，科举发展基本上是以唐朝的制度为本，甚至比唐代更重视文人。

宋初开始提倡文治（重文轻武），以文人领军、管制军队，甚至制定了一系列的官

⁷⁰在这二三千人当中，寒士是属于少数的。所谓的寒士，实则仍属于地主阶级，田产物业一般并不缺乏，所缺的只是权势。对于地主阶级的家庭而言，科举的参与关乎到家道兴衰的头等大事，因此，注重科举制度并非只是朝政之要事而已，然而它确是由上至下、由富至贫，全国举注的一项事情。

【唐】傅璇琮：〈乡贡〉，《唐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7。

僚制度如二府三司制、不准许杀上书言事人、提高文人俸禄，增加文人录取名额等的制度，可见在于宋时期文人的地位日益在各个方面占据了社会统治地位。因此，宋代特重科举考试。为了防止作弊案件兴起，考试制度也就日益严格。例如废除行卷、省卷，试后封卷胆录等方法⁷¹，他们从科举考试选拔出大量的人才，往往一次取士当中就录取了四五百名士人。可见，宋士人地位比唐代更为显著。

由于宋代时期的经济非常发达⁷²，影响了往后的朝代如明代、清代的商业显得经济繁荣十分，工业及农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北京、南京、天津、苏州、上海、汉口、扬州等地都是一片商业社会的繁荣景象。由此，商业在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中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商人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与此同时，士商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即“士与农商常相混”⁷³。〈詹仰之墓志铭〉则曰：“今为学者，其好则贾而已矣，而为贾者独为学者之好”⁷⁴。可见，士人好贾而商人好儒，士人经商与商人业儒的现象普遍发生，构成明代中后期至清代前期士商渗透的现象。然本文注重的是士人弃儒从商的现象，商人业儒的部分则一概不谈。士人好贾的现象归咎以下几点：

⁷¹ 付乐成：《中国通史》下册，中国：弘扬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页589。

⁷²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街市货卖之盛，上至“金银彩帛交易之所”，下至“粥饭点心”，“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靡不具备。而“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城中商贾，各有专司，分行列市，有条不紊。如潘楼街南之“界身巷”，“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至于娱乐全城各阶层百姓的歌楼，更是人烟浩攘，箫鼓喧空，把东京城的繁华推向了顶峰。【宋】孟元老、邓之诚注：〈东角楼街巷〉，《东京梦华录》卷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年，页66。

⁷³ 【明】归有光、周本淳校点：〈白庵程翁八十寿序〉，《震川先生集》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页320。

⁷⁴ 【明】归有光、周本淳校点：〈詹仰之墓志铭〉，《震川先生集》卷上，页479。

其一、商品经济的繁荣诱使士人加入商贾行列。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整体上提高了社会生活水平，而商人则居于经济生活的上层。因此，贫困的士人阶层纷纷经商事贾，以求改善经济状况。

其二、政治腐败使官商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虽然明清两代政府严厉禁止官僚经商，但政治腐败，政策无法顺利执行，使经商之风遍及官场。清代官僚经商甚至发展“假称奉旨，贩卖私盐，得银百六十余万两”⁷⁵的局面。故可得知，为了取利，不少官僚冒险经商，这大大地促进了士人经商的发展。

其三、科举竞争的日趋激烈及科举制度的弊端使许多士子转向商业领域。虽然明清时期，科举竞争越来越激烈，取士名额基本没有变动。清代的取士名额亦增加不多，士子考取功名的机会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明清实行捐纳制度，只要交纳一定的钱粮，即可进国子监读书，出监后可以作官。于是，许多读书人纷纷弃儒经商，“从事贸易以自适”⁷⁶。

其四、儒学内部价值观念的转变。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中，一向漠视功利，尊崇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早期儒家的价值观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⁷⁷和“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⁷⁸。到宋代，程朱理学主张“灭私欲则天理明矣”

⁷⁵ 蒋良琪：〈康熙四十四年正月至康熙四十七年十二月〉，《东华录》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页322。

⁷⁶ 见【清】聂志剑纂《清江香田聂氏重修族谱》上卷，转引自乔凌霄、梁衍东：〈明清社会的士商渗透及其影响〉，《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页85。

在

⁷⁷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论语仁第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983年，页73。

⁷⁸ 【汉】班固撰、颜师古注：〈董仲舒传〉，《汉书》卷五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2500。

⁷⁹，要求人们抑制自身欲望以及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显然不适应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社会趋势。明代李贽认为“穿衣吃饭既是人伦物理”⁸⁰，把人的日常生活需要视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和本质。清代思想家颜元则更鲜明地提出了“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⁸¹的著名论点。可见，重义轻利价值观已随着时间而改变，变得以利为主，商业的性质也随之显现出来。

从上述看来，虽然商人转换的地位与士人息息相关，然而，不能忽视的还是在在于外在因素商业与经济本身主要条件发展的影响。因此，这种因素影响了明清士人对支撑人格独立与尊严之经济保障的重视。⁸²正是这种观念，让四民排名最后的商人，一跃而起。由此，从士人到商人身份转变之际影响了青楼所展示的功能。

第二节 身份转换对青楼功能之影响

就如上文所说的，唐宋社会重视科举制度，士人在社会上享有殊荣，故而唐宋时代的名公士夫、文人雅士基本上为青楼妓女所欣赏的。因此，笔者认为商人与士人相比，以前许多青楼妓女认为商人不懂得附庸风雅，因此对于商贾的态度，似乎怀着一种先天性的鄙视心理，尽管在事实上她们的社会地位更低下。虽然在于那个朝代的青楼业是鼎盛非凡的，然往往是士人抒发个人情感以及寻找知音甚至是精神层面上的慰藉。这些莘莘学子日日夜夜将自己的精神都沉浸于科目当中，以至

⁷⁹ 程颖、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322。

⁸⁰ 【明】李贽、刘幼生整理：〈答邓石阳〉，《焚书·续焚书》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页4。

⁸¹ 【清】颜元著、王星贤等点校：〈四书正误〉，《颜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页520。

⁸² 蒋文玲：〈明清士商渗透现象探析〉，《江海学刊》，1995年第1期，页82。

于没办法释放精神以及纾解心中的压抑，导致精神紧绷、心理甚感负担及沉重。于是，他们唯有选择能在视觉、听觉中寻找甚至得到满足的佳处则是无过于青楼。

其二，唐代士大夫婚姻沿袭六朝之风，看重门第，如娶五姓女⁸³。这种婚姻主要是家族之间财产和权势的结合，完全不考虑当事人的情感及心情，因此制造了许多同床异梦的夫妻。唐代笔记多有述及士大夫婚姻不和睦，如白居易、房玄龄等等。于是青楼就成了士大夫阶层摆脱家庭、伦理负担，获得心理松弛与平衡的绝妙场所。

除了寻找精神寄托及得到充分的娱乐以外，其实他们更想借助青楼与妓女之间的关系来为自己扬名的需要。众所周知，唐代重诗歌，宋代重词，士大夫不仅善于吟诵，即使是下层社会的市民，也能够吟诵。因此，一个文人的诗名和文名的高下也就和他最终能不能得到这些权臣的推荐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以至于他最后究竟能考中或是考不中，有了因果关系。即使不从科举的角度来考虑，作为诗人他总是希望自己的这一首诗作能够被于管弦，出之于佳人之口给唱出来，广为传诵。而诗歌的最好的传播的媒介则无过青楼。此中经常是公卿、士大夫聚集的场所，而歌诗奏乐又是妓女的职业的所长，故此文人亦或是仕人都会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因此文人与青楼妓女之间就形成了一个互补关系。西方妓院自古希腊、罗马至今，主要解决性欲问题，中国的青楼则不然，性交易不是其主要内容。⁸⁴诚如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他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原因其实在于他们渴望与女人

⁸³《新唐书》载：“今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五姓。”唐人习惯上以“五姓”为高门，这首先当然与唐代社会重门第的风气是密不可分的。盛行于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至唐代虽已废除，但门第观念作为衡量人们家世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准，仍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在婚姻方面表现最为突出。除了受重门第的风习影响外，唐代士子热衷于娶高门望族女为妻也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为了攀附高门并进而博取名望和禄位。【宋】欧阳修、宋祁撰：《柳冲列传》，《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页5678。

⁸⁴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页6。

建立一种无拘无束、朋友般的关系，而不一定得发生性关系。一个男人可以与艺妓日益亲昵，但不一定非导致性交不可。⁸⁵因此，笔者认为这些唐宋士人到青楼的主要目的，其实还是想要寻找知音以及精神寄托，性欲问题则处于其次。

尽管如此，一直处于社会特权地位的士人们，却在明代中叶以后呈现出贫困地位下降的情况，与商人的兴旺崛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学者樊玉梅统计了《海上花列传》的狎客形象较重要的有 27 人，其中商人 16 个，占 60%；文人 3 人，占 11%；官员 2 人，占 7%；另有享乐公子 4 人，流氓 2 人。⁸⁶可见在当时候，文人地位已一落千丈，商人代替文人成为了消费的主力。小说第三十一回写了一个文士叫方蓬壶，由于经常写几首小诗登在“新闻纸”（报纸）上，颇有几个人认得他。但没有谁会去捧他，巴结他，反倒因为他过于迂酸而被高亚白等人瞧不起，不仅非常不给面子地在他吟作诗的时候高声划拳，还讥讽他那点文才只配去“倒夜壶”⁸⁷。文君玉是个妓女，却因为时常吟诵小诗、感叹上海没有文人雅士而遭相帮嘲笑，并因此而生意清淡。从此处看来，文人不仅地位一落千丈，甚至还在与当时候与社会是格格不入、被人奚落、被人嘲笑、受人看不起。

《海上花列传》中的商人成为消费的主力，而嫖客间的转变，也让青楼所展示的功能随之转换。它不再是古代时候士人只想寻找知音或是精神寄托之佳处，反观，妓院中虽看是声色娱乐之地，其实正进行着“严肃”的商业活动。对于商人而言，

⁸⁵高罗佩著，李零、郭晓惠译本：《中国古代房内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239。

⁸⁶樊玉梅，刘上生：〈《海上花列传》青楼世界的都市文化特征〉，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31卷第2期，页73。

⁸⁷韩邦庆著，姜汉椿校注：《海上花列传》第三十三回，页325。

谈生意最需要的就是一种高级的、体面的、稳定的社交场所，而这场所就非青楼莫属了。这时候的青楼，正展示出商业化的功能。

其一、让商人互相交流信息，提供商业机会。文中开篇便叙述洪善卿与庄荔甫在陆秀林的书寓中洽谈生意的场景。庄荔甫一出场就向洪善卿打听道：“正要来寻耐，有多花物事，耐看看阿有啥人作成？”⁸⁸而在第二十六回庄荔甫在嫖客闲谈中得知齐韵叟来上海的消息，当时就敏感到会有生意做。

次日早晨，荔甫心记一事，约至七点钟警醒，嘱秀林再睡，先自起身。……荔甫便不再问，略揩把面，即离了聚秀堂，从东兜转至昼锦里样发吕宋票店。陈小云也初起身，请荔甫登楼厮见。小云讶其太早，荔甫道：“我再要托耐桩事体。听说齐韵叟来里哉。”……荔甫道：“阿可以托相熟个去问声俚，阿要交易点。”小云沉思道：“就是葛仲英，李鹤汀末搭俚世交，要东写张条子去托俚喲。”荔甫欣然道谢。

89

正是这些信息的交换促成了庄荔甫两笔交易的成功。

其二，交流感情，扩大交游也是青楼所展示其一之功能。朱蔼人亲自把才 16 岁的弟弟带进欢场，因为商人在生活交游不广便寸步难行，而要认识几个有头有面的人物是离不开妓院的，所以从小就得让他在欢场历练；姚二奶奶也深知丈夫（姚季莼）要“巴结生意，免不得与几个体面的往来把势场中”。⁹⁰由此，青楼释放了广阔的交游空间，让嫖客自由选择甚至开阔他们的商业视野。

⁸⁸韩邦庆著，姜汉椿校注：《海上花列传》第三十三回，页 334。

⁸⁹韩邦庆著，姜汉椿校注：《海上花列传》第二十六回，页 261。

⁹⁰韩邦庆著，姜汉椿校注：《海上花列传》第五十六回，页 548。

其三，商人在青楼中进行交易，以获得盈利。洪善卿是永昌参店的老板，兼作掮客。他逛妓院只是为了生意，王莲生来上海后，许多不便办的事情，如沈小红和张惠贞之间洪善卿帮忙奔走调和，代为采办各种奢侈品，而从中获利。如小说第二十三回说：

莲生向蕙贞道：“耐要买翡翠物事，教洪老爷到城隍庙茶会浪去买，便宜点。”

蕙贞因要买一副翡翠头面，拜托洪善卿。善卿应诺，辞别先行，自回南市永昌参店去了。⁹¹

小说三十三回也说：

饭后，善卿遂往城内珠宝店去。……自鸣钟正敲五下，善卿已自回来，只买了钏臂、押发两样，价洋四百余元，其余货色不合，缓日续办。莲生大喜谢劳。⁹²

另外，洪善卿帮忙周双玉勒索朱淑人一万两银子的大买卖也是在妓院完成的。由此看来，大部分商业活动在商人直接碰面中完成。反观，吃花酒对于他们而言，不是纯粹的娱乐行为，而是具有商业性的“紧要事”。

其四，商人展示财力，以增加体面。黎篆鸿是大富人家，叫局大手笔，一叫就是四局。连带请来的客也替他们叫四局，共二十多名信人齐齐出现，出手阔绰，正如李鹤汀所说：“家有多少姨太太，外头堂子多。……”⁹³连尤如意也成为他外头开的私家赌局的妓女。除此之外，小说第十九回写黎篆鸿做生日，朱氏、陶氏及李氏兄弟、叔侄替他做公局。日间在“大观园”演戏。请来上海唯一的三班髦儿

⁹¹韩邦庆著，姜汉椿校注：《海上花列传》第二十三回，页 229。

⁹²韩邦庆著，姜汉椿校注：《海上花列传》第三十三回，页 321。

⁹³韩邦庆著，姜汉椿校注：《海上花列传》第十四回，页 152。

戏。晚上在屠明珠处大宴亲戚朋友，款气十足。可想而知，黎篆鸿的富有，相知满天下。这样的势力，展露出他的威风，让他每次进场，“众人都必须上前厮见”⁹⁴，极力吹捧他。

小结

综观上述，虽然商人转换的地位与士人息息相关，然而，不能忽视的还是在于外在因素商业与经济本身主要条件发展的影响。因此，这种因素影响了明清士人对经济保障的重视。对于这种重视，也让四民排名最后的商人地位，一跃而起。由此，从士人到商人身份转变之际也影响了青楼所展示的功能。青楼在士人身份除了及得到充分的娱乐以外，最为重要的还是在于寻找知音及精神寄托甚至让自己扬名的需要。反之，商人的身份，却也给青楼换上不同的内质。对于商人来说，青楼成了交换信息、交易、应酬等的场所。不同的人物，青楼展示着不同的功能，是值得关注的。

⁹⁴韩邦庆著，姜汉椿校注：《海上花列传》第十九回，页 183。

结论

毋庸置疑的，时代大背景将影响全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物质生活上，抑或是人物思维与地位的转变，都是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海上花列传》所展示的内容则处于晚清上海这个大都市。上海租界是西方人的领地，也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重要据点。因此，其青楼文化受之转换与更改更是轻易奏效。

基本上，《海上花列传》青楼生活中处处充满西化韵味。虽然物质内容还保留了一些旧有的，然而更多的是已经受了西化的影响，形成了亦土亦洋的内质转换。例如前文中提及的“烟、赌、酒”是古代青楼中所拥有的内质，也是必有的娱乐内容之一，然晚清时期却夹杂了西方文化的内质使之旧有内容转换了。中西方元素的交会、渗透以及融合汇通的过程中，在物质文化上的融合是显而易见的。再者，文中提及中国引进了西洋大菜，干果等等的西洋食品作为妓女与嫖客之间的食品，虽看似市民已接受与适应，然而实况看来，他们的反映却是与此相反。由此可见，这样的文化冲击，很多时候市民是来不及接受以及适应的。青楼本是一座糜烂且让人沉沦甚至不可自拔的场所，然而从文中所举出的例子，西方文化的入侵，却是让整座青楼从原有的面貌更换甚至形成让人们更为堕落、沉迷的局面。

除此之外，中古时期的妓女，基本上是属于士大夫的附庸地位。她们的仪态修养、谈吐服侍都与士大夫的好尚相适应；她们的雅俗之分，美丑之判断也大抵认同于士大夫的标准。由于明代中叶的社会商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以工商业为主的市民阶层更加发展壮大起来；儒学内部价值观念的转变以及清朝太平天国革命者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潮的影响，因此，由妓女附庸意识开始逐渐转变为自主意

识。例如文中所提及的妓女如黄翠凤、赵二宝、李漱芳等人所展现的自主意识显示了她们除了满足物质生活以及虚荣心以外，其实最为想成为独立的个体、让生活以及个性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甚至欲摆脱长期被嫖客、老鸨的控制。

再者，虽然商人转换的地位与士人息息相关，然而不能忽视的还是在于外在因素商业与经济本身主要条件发展的影响。因此，这种因素影响了明清士人对经济保障的重视。对于这种重视，也让四民排名最后的商人地位，一跃而起。由此，从士人到商人身份转变之际也影响了青楼所展示的功能。青楼在士人身份除了及得到充分的娱乐以外，最为重要的还是在于寻找知音及精神寄托甚至让自己扬名的需要。反之，商人的身份，却也给青楼换上不同的内质。例如文中的洪善卿、黎篆鸿、庄荔甫经常进出青楼。他们进出青楼的主要目的就是因为谈生意、重生意的缘故而经常与青楼、妓女为伴。由此，青楼亦成了交换信息、交易、应酬等的场所。

换句话说，在晚清时期青楼文化“传统”的改变，一方面是源于西方的刺激，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传统”自身改变的力量。青楼“现代”的形成并非只是西方的催化，其中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融合、转化及质变有更复杂的原因作用于其中。因此，晚清青楼文化“传统”与“现代”，不该是对立的两端，是新与旧的碰撞融合正以各式各样的姿态发生，并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虽看似只专注在青楼文化中的转异点，然往往更是显示出社会变质的一个重要元素所在。

参考书目

1. 【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年。
2. 陈永健：《三摯海上花》，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3. 池志澂：《沪游梦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4.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年。
5.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6. 韩邦庆著，姜汉椿校注：《海上花列传》，台北市：三民书局出版社，1988年。
7. 【清】韩邦庆著；张爱玲注译：《海上花落·国语海上花列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
8. 胡适：《胡适文存》，台北：洛阳出版社，不著年、月。
9. 【唐】范摅：《云溪友议》，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10. 付乐成：《中国通史》，中国：弘扬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
11.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12. 【明】归有光、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3.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14. 蒋良琪：《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15. 焦润明、苏晓轩：《晚清生活掠影》，沈阳：沈阳出版社，2002年。
16. 【宋】李昉编纂，夏剑钦校点：《太平御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17. 李淑贞：《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教程》，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年。
18. 【明】李贽、刘幼生整理：《焚书·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 年。
19. 刘半农：《刘半农文选》，台北：尔雅出版社，1978 年。
20.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 年。
2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
22. 【法】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55 年。
23. 【宋】孟元老、邓之城注：《东京梦华录》，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 年。
24.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 年。
25.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0 年。
26. 钱民辉、田玉荣：《中国女性行为的文化释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
27. 汤志钧等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年。
28. 唐振常：《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2 年。
29. 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年。
30.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31. 王德威：《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台北：麦田出版社，1993 年。
32. 汪中著、田汉云点校：《新编汪中集》，扬州：广陵出版社，2005 年。
33. 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年。

34. 【清】颜元著、王星贤等点校：《颜元集》，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7年。
35. 叶文心等合著：《上海百年风华》，台北市：跃升文化出版社，2001年。
36. 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37.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8. 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济南：齐鲁书出版社，1890年。
39.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年。
40. 庄仁杰：《晚清文人的风月陷溺与自觉——《品花宝鉴》和《海上花列传》》，台北市：秀威资讯科技出版社，2010年。

参考期刊

1. 樊玉梅：〈论《海上花列传》青楼生活的代特色〉，《商业文化·学术版》，2008年第8期。
2. 樊玉梅，刘上生：〈《海上花列传》青楼世界的都市文化特征〉，《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3. 方迎久：〈韩邦庆佚诗文钩沉〉，《明清小说研究》，南京：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2002年。
4. 黄淑贞：《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人物研究》，新竹：玄奘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硕论，2005年第1期。
5. 江江明：《从性别政治论海上花列传中的娼妓生存》，嘉义：南华大学硕论，2003年第3期。
6. 蒋文玲：〈明清士商渗透现象探析〉，《江海学刊》，1995年第1期。
7. 陆杰：〈科举、文人与青楼：晚清狭邪小说的类型变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8期。
8. 罗岗：〈性别移动与上海流动空间的建构：从海上花列传中的马车开谈去〉，《东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9. 吕文翠：《现代性与情色乌托邦：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研究》，台北：辅仁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博论，2004年第2期。
10. 乔凌霄、梁衍东：〈明清社会的士商渗透及其影响〉，《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
11. 申欣欣、张昭兵：〈西风美语话“青楼”——《海上花列传》中名妓及高级妓院社会功能研究〉，《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12. 袁进：〈略谈海上花列传在小说城市化上的意义〉，《明清小说研究》，南京：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2005年。